

澳洲與日本安全關係之「避險」策略

黃恩浩

副研究員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

摘 要

中國崛起的現象對澳洲與日本雙方而言，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上的機會，同時也是一個政治軍事上的挑戰。究竟要如何接受機會並且同時避免威脅，這個議題因此是雙方在印太區域中所面臨的重要考驗。再者，澳日雙方在二戰後的國家安全都是以與美國簽署的軍事同盟條約為保障，在面對中國積極擴張與憂慮美國孤立主義可能再起的心態下，因此日澳近年在「避險」的思維中積極發展雙邊安全關係，並以澳日雙邊關係為基礎來影響國際或區域多邊關係。一般而言，國家對威脅的主觀認知乃是形塑國家行為與國際互動的重要關鍵，在中國崛起與美中競爭之背景下，本文的問題意識是，究竟澳日雙邊安全關係是如何形成的？其建構方式為何？為回答這問題，本文乃試圖以國際關係領域中「避險」的概念來分析之。

關鍵詞：澳日安全關係、權力平衡、避險策略、雙邊主義、多邊主義

“Hedging”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Japan

Paul A. Hu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For Australia and Japan, the rise of China i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for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hallenge to their security setting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mitigate threats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diplomatic test for both sid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Moreover, Australia and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has been guaranteed since World War II through a treaty of military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ace of China’s active expansion and concerns about the resurgence of American isolationism, Australia and Japan have been actively developing b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adopting a “hedging” approach that impact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multilater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ir bilateral ti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nter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hreat by a state is crucial in shaping its behavior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main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how Australia and Japan reached a consensus on establishing b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s and how this consensus is constructed.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it through the concept of “hedg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Australi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Balance of Power, Hedging Policy, B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壹、前言

自從澳洲前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 2007 年 3 月 13 日簽訂《日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之後，¹雙邊安全關係就開始進入後冷戰時代的新里程碑，雙方開始視彼此為美國以外的重要安全夥伴與「準同盟國」，以因應中國崛起的趨勢和中美大競爭下國際局勢。澳洲更早在 2007 年 7 月發表的《澳洲的國家安全：2007 年國防更新》（*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 Defence Update 2007*）白皮書中清楚以「澳洲在區域上沒有像日本這樣緊密且具有價值的朋友」²這句話來描述雙邊關係。前日本首相安倍當時也強調，澳洲是日本緊密且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澳日雙方領導人更於隔年 6 月更簽署《全面戰略、安全與經濟夥伴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以表達建構雙邊安全關係的決心。自 2007 年澳日簽訂共同宣言以來，首次實際合作表現就是日本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大地震的災後聯合救災行動（稱為「日本 311 大地震」或「東日本大震災」），當時澳洲國防部提供一支都市搜救隊、3 架 C-17A 軍用運輸機與多個遙控水泵設備前往日本，同時與日本自衛隊與美國軍隊進行聯合救災行動。³

在這共同宣言的基礎上澳日安全關係的距離就不斷地拉近，例如：雙方在 2010 年 5 月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Defence 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並於 2013 年 1 月生效；在 2013 年 3 月簽訂《情報分享協定》（*Information Sharing Agreement*），雙方據此可交換機密情報；在同年 10 月，在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中達成「共享軍事資源聯合聲明」；在 2014 年 7 月簽訂《防衛裝備及技術轉移協定》

¹ Tomohiko Satake, "Australia-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IIA), February 18, 2016,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ustralia-japan-security-cooperation/>.

²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 Defence Update 2007," 2007, p. 19.

³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Operation PACIFIC ASSIST- Extension of ADF Relief Efforts in Japan," March 19, 201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601183849/http://www.minister.defence.gov.au/Smithtpl.cfm?CurrentId=11609>.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可共同開發國防軍事裝備；在 2015 年召開外交與國防部長二加二對話，強調深化強化雙方軍事合作共同反對中國海上擴張，雙方領導人在同年亦簽署《邁向特殊戰略夥伴關係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Next Steps of the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在 2017 年 1 月簽訂修正版的《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可彼此提供後勤支援及必要協助，將共享範圍拓展到彈藥項目，並於同年 9 月生效；在 2020 年 11 月 17 日雙方同意就《互惠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內容進行談判，為兩國軍隊互訪進行訓練和聯合軍事行動建立法律框架，⁴並在 2022 年 1 月 6 日就《互惠准入協定》進行最後協調並簽署之；⁵以及雙方在 2021 年進行外交與國防部長二加二對話，為深化及確保雙邊在國家安全及軍事上的合作。

若僅從權力平衡的角度來看，澳洲與日本關係之所以能夠以安全合作為發展方向，乃是以扞從美國並抗衡中國崛起對區域造成的威脅為前提，並作為雙邊關係發展之驅動力，這種關係的發展不僅被稱為抗中「圍堵聯盟」(*Containment coalition*)，⁶亦被稱為以美國為中心的「競爭戰略幾何」(*Competitive Strategic Geometry*)。⁷然而，僅從抗衡與扞從這個二元邏輯來看待澳日安全關係的建構似乎不夠周延。在面對中國擴張以及與美國同盟的背景下，澳日都面臨了國家安全戰略上的兩難，所以必須在這現實主義的二元邏輯中思考第三條道路。確切的說，日澳雙方基於有限的軍事力量、與美國緊密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及與中國維持緊密的經貿互賴等，為了避免直接與中國發生明顯的競爭與衝突，以及考慮到美國對亞洲安全承諾可能的變化，雙方因此採取聯合「避險」的方式來抵銷且分散中國的擴張威脅與造成的安全風險。也就是在與中國經貿合

⁴ Oleg Paramonov, "Japan and Australia: What the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Is All about," *Modern Diplomacy*, December 15, 2020,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0/12/15/japan-and-australia-what-the-reciprocal-access-agreement-is-all-about/>.

⁵ 小山，〈日澳今簽《互惠准入協定》防衛合作邁大步〉，《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22 年 1 月 6 日，<https://www.rfi.fr/tw/國際/20220106-日澳今簽-互惠准入協定-防衛合作邁大步>。

⁶ Aurelia Geogre Mulgan, "Breaking the Mould: Japan's Subtle Shift from Exclusive Bilateralism to Modest Minilater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1 April 2008, p. 54.

⁷ William T. Tow, "Asia's Competitive 'Strategic Geometries': The Australian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1 April 2008, pp. 29-51.

作以及與美國安全合作的同時，⁸亦提升雙邊安全關係以因應來自中國的軍事擴張壓力與對國際秩序的挑戰。據此，澳日安全關係的建構可以說是雙方採取避險策略的戰略考量。

雖然日澳在 2007 年簽署的《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只是一紙兩國領導人簽署的聲明，並非是正式的軍事同盟條約 (treaty)，甚至也稱不上是國際安全協定 (agreement) 或公約 (pact)，雙方要發展到真正的軍事安全同盟還有很長一段距離。但是從 2007 年迄今的澳日安全關係發展來看，雙方在軍事安全方面已經簽署了一些如上述的特定協定，可見澳日安全關係自簽署該共同宣言以來就密切且積極在朝「準軍事結盟」方向發展。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澳洲與日本近年來在面對中國崛起與美中競爭的態勢中，澳日之間雙邊安全關係的建構與結盟，究竟是為了面對中國在西太平洋擴張行為所進行的「抗衡」(balancing)？或者是因應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略部署所進行的「扈從」(bandwagoning)？還是為了邁向第三條路？為了探索這個問題，本研究因此試圖在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的「抗衡」與「扈從」之兩元論述之外，採用「避險」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並從相關政策文獻分析澳日建構安全關係的動力，以及雙方共同採取聯合避險的作為。

貳、「避險」思維與澳日安全關係

依據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邏輯，國家行為者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面對強權崛起時，「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是確保國際體系穩定與避免大規模戰爭的戰略、政策與作為。權力平衡的論述包含「內平衡」(Internal Balancing) 與「外平衡」(External Balancing) 兩個部分。前者指國家行為者擴充其內部軍事能力並提升其經濟和工業基礎建設以強化國家實力；後者是指國家行為者為制衡外部潛在侵略者而追求國

⁸ 在 2007 年中國不僅首次成為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也首次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2007 年第 1 季澳中貿易總額達 527 億澳元，超過澳日貿易額之 506 億澳元，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澳洲最大貿易夥伴，尤其對鐵礦砂、煤炭等原物料，中國亦已超過日本成為澳洲最大買家。請參考：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有關中國已成為澳洲最大貿易夥伴及 2007 年第一季澳洲貿易概況〉，《經貿透視雙週刊》，2007 年 5 月 9 日，<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459595&iz=6>；〈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BBC 中文網》，2007 年 4 月 26 日，http://wwwnews.live.bbc.co.uk/chinese/trad/low/newsid_6590000/newsid_6594300/6594347.stm。

際結盟以鞏固國家安全。⁹理論上，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體系中不是採取「抗衡」就是「扈從」策略以確保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然而，不管是抗衡或扈從在實際操作上都需要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Risk)與「不確定」(Uncertainty)的戰略後果。¹⁰就內平衡而言，其可能會陷入內部資源分配錯置危機，導致國內社會基礎建設的不穩定；就外平衡而言，其可能會陷入被聯盟制約或背棄的危機，導致國家安全環境險峻。因此，近年來很多中、小型國家開始普遍採取一種「既非抗衡亦非扈從」或「即是抗衡亦是扈從」的「避險」(Hedging)中間政策，在就是在抗衡與扈從之外的採取其他外交戰略途徑，以因應大國崛起與大國對抗的國際態勢，同時保持國家政策自主性與軍事決策彈性。¹¹

一、「避險」概念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界定

在現實主義論述的思維下，加上對國家外交作為的實證研究經驗（像是對日本與澳洲外交政策的相關研究等），因此開始有許多學者將「避險」的概念引進權力平衡的論述之中，並將其視為是可以取代「抗衡」與「扈從」二元論述的第三條道路。¹²在現實的大國競爭環境之間，國家積極追求避險這第三條路來降低對抗或衝突的成本，主要是因為一旦同時採取經濟扈從與軍事抗衡兩手策略就會面臨選邊站的衝突壓力，例如：澳洲與日本為了國家經濟發展之故，在經貿上必須倚賴崛起的強權中國；然而為了國家安全之故，在軍事與政治上又必須向強權美國靠攏，這因此使得澳日雙方必須時時根據美中關係的變化調整這兩手策略。再者，為了降低在美中戰略競爭結構下採取「經濟傾中、安全傾美」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澳日雙方因此近年來不僅積極尋求雙邊安全合作，也共同參與國際多邊合作，以期減少對中國的經貿依存，同時也可以分

⁹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118, 163.; Jack Levy,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03), p. 135.

¹⁰ Cheng-Chwee Kuik,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62-163.

¹¹ Darren Lim,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4, 2015, p. 701.

¹² Kei Koga,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0, No.4, 2018, pp. 636-637.

散對美國的安全依賴。

在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的論述脈絡中，關於「避險」的研究與界定有很多，有學者強調「避險」是一種「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的操作，例如：美國蘭德智庫(RAND)學者麥艾文(Evan S. Medeiros)在研究亞太區域安全秩序時，就將「避險」定義為是國家對外的兩手策略，即一方面在雙邊關係與多邊機制中加強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推行現實主義的制衡戰略，透過提高本國軍力或加強和他國安全合作的方式制約目標國。¹³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教授郭清水(Cheng-Chwee Kuik)則認為，「避險」是國家藉著追求外交多邊主義政策選擇來抵銷危機，並在高度不確定與高度利害關係下使之能產生相互抵銷的效果。¹⁴

再者，亦有學者從「混和」策略角度分析，例如：澳洲國立大學教授吳翠玲(Evelyn Goh)指出「避險」意指，國家在面臨潛在威脅時，避免在制衡、扈從或中立等傳統選項間作出抉擇，改而採取一種「混合」多元策略的外交作法，以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¹⁵美國俄亥俄大學教授魏茲嫻(Patricia A. Weitsman)則提出「避險同盟」(Hedging Alliance)的觀點，說明能力有限的中小型國家在面臨外在安全威脅時，會採取一種「混合戰略」(Hybrid Strategy)，一方面設法和造成潛在威脅的國家交往，另一方面則尋求加強和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的關係，藉以牽制構成潛在威脅的國家。¹⁶

綜合上述，避險概念在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國家行為者刻意進行多元化的外交行為，讓第三國(具威脅的國家)可以由不同的角度來解讀「避險國」(Hedger)不選邊站的善意行為訊息，進而調整其對避險國的外交、經濟或軍事上的針對性，避險國也就能夠迴避掉來自第三國的壓力。國家之所以會操作避險的行為主要是為了降低抗衡與扈從所帶來的危機與不確定性。而這風險與不確定性要素可謂是兩個相關且主觀的

¹³ 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5-2006, pp. 145-146.

¹⁴ Cheng-Chwee Kuik, op cit., p. 163.

¹⁵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East West Center, 2005), pp. 2-4.

¹⁶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30.

國家行為動機，其最主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可能性」(probability)。換言之，危機意指涉及在一連串具體的行為下所導致可預見的負面結果產生之可能性，而不確定性則是指一種無法預測的概念。¹⁷因此，本文認為「避險」可界定為，國家行為者企圖在大國競爭結構下採取「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外交並與其他國家「戰略結盟」(Strategic Alignment)方式，來尋求在大國競爭結構中抗衡與扞從兩元抉擇之外的安全途徑，從而降低或避免大國競爭負面後果帶來的安全風險與不確定性。

二、澳日建構安全關係中的「避險」考量

澳日安全合作關係的發展越來越緊密，有許多論述認為這關係背後的現實因素就是中國崛起與擴張。對此，有日本與澳洲學者都提出同樣的看法。在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山本吉宣 (Yoshinobu Yamamoto) 認為，從澳日安全關係發展而來的「集體避險」(Collective Hedging) 主要是針對中國而來。同志社大學教授寺田貴 (Takashi Terada) 亦認為，對中國因素的考量是促成澳日兩國緊密發展安全關係的重要特色。¹⁸在澳洲方面，新南威爾斯大學教授穆肯 (Aurelia George Mulgan) 從新現實主義角度描述澳日關係發展的背後動機，認為其雙邊安全合作就是一種對抗中國的「圍堵聯盟」。¹⁹澳洲國立大學教授陶威廉 (William Tow) 用「競爭戰略幾何」的概念分析，同樣認為澳日再以美國為軍事同盟中心的三角戰略架構下強化雙邊安全關係，就是在為了因應中國威脅的壓力。²⁰

雖然上述學者各依不同角度解釋但都清楚認為，澳日安全關係展現出來的是雙方共同對中國崛起現象的政策性表達，但是這些論述邏輯仍存有尚未調查的疑問之處，像是尚未充分解釋澳日關係與中國崛起的連結性、美國在澳日安全關係發展中的參與程度，以及澳日在地緣政治基礎上處理中國議題的概念與途徑是否分歧的問題（換言之，與日本相較之下，澳洲地理位置距離中國較遠，所以事實上澳洲對於中國崛起與威

¹⁷ Stephan Fruhiling, *Defense Planning and Uncertainty for the Next Asia-Pacific War*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4), p. 20.

¹⁸ Yoshinobu Yamamoto, "Triangularity and US-Japanese Relations: Collaboration, Collective Hedging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William Tow, Mark Thomson, Yoshinobu Yamamoto, and Sato Limaye (eds.), *Asia-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77.

¹⁹ Aurelia George Mulgan, op. cit., pp. 29-51.

²⁰ William T. Tow, op. cit., p. 54.

脅對國家利益與安全的感受，都遠不如日本來的急迫真實)。²¹若沒有在事實層面周延的來探討這些疑問，要論述澳日安全關係發展是為了分散中國擴張威脅造成的風險，這因果分析就會顯得不精確，本文因此有必要在分析這個議題時著重在美中競爭下澳日安全關係強化與中國因素的連結。

檢視後冷戰時期東亞關係的發展，可以發現到該區域的國際體系隨著中國在 1990 年代的快速崛起，已經逐漸由美國主導下的單極體系走向一個多極體系（中國方面形容為「一超多強」），在西太平洋地區因此呈現一個準兩極體系的局面。在這國際結構的轉變過程中，自二戰以來就與美國保持軍事同盟關係的澳洲與日本都考慮到，中國快速的軍事實力將可能會趕上美國（甚至焦慮美國孤立主義再現），加上中國廣大經濟市場的影響力，導致雙方在扈從美國主導的西太平洋秩序之基礎上抗衡中國對區域的挑戰，逐漸發展成在美中大國競爭的結構環境中尋求「避險」這條路。宏觀來說，澳日安全關係的發展，並非是美國主導推動下的產物，但是雙方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卻可說雙方安全關係的互信基礎架構。因應中國擴張壓力是澳日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可否認雙方也都考量到美國可能發生的「孤立主義」（例如：澳洲曾經歷了戰後英國從亞洲撤軍，日本怕美國從南韓與日本撤軍，澳日都經歷到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以及美國決定從阿富汗撤軍等等）對區域帶來的安全風險，所以澳日安全關係逐漸走向「準同盟關係」可謂是個聯合「避險」且可相互支援的作法。儘管澳洲在地緣上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不如日本與中國近距離真實，但是西太平洋經濟與安全一體化的趨勢中，地緣位置在澳日共同追求避險的安全同盟策略中似乎已不是個重點。

參、從敵對邁向合作的澳日關係發展背景

回顧二戰時期的太平洋戰爭歷史，當大英國協所屬殖民地新加坡島在「新加坡戰役」（1942 年 2 月 8-15 日）被日軍攻陷後，澳洲政府對日本的入侵開始感到迫在眉睫。日本當時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入侵，但澳洲

²¹ Nick Bisley, "The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Declaration and the Changing Regional Security Setting: Wheels, Webs and Beyon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1, March 2008, p. 47.

缺乏足夠的防禦能力，因此轉向靠攏美國。²²日本當時還計劃對澳洲本土發動攻擊，先派空軍轟炸北澳的達爾文再入侵當時澳洲托管的新幾內亞區域，甚至派潛艇進入到雪梨港執行伏擊。在美軍決定出手援助，強化澳洲本土及周邊島嶼的防衛後，加上日軍在珊瑚海與中途島遭遇挫敗，聯軍才扭轉了日本入侵太平洋這場戰局。太平洋戰爭之後，當時澳洲對日本態度相當嚴厲，不僅不接受日本投降，亦要求將日本裕仁天皇列入戰犯審判，而這段歷史更讓澳洲人耿耿於懷。

在冷戰期間，澳洲與日本才逐漸從敵對態度緩慢發展出低調且有限的安全合作關係，包括：在情報交換領域與區域安全合作方面。就情報交換領域而言，為了監視共產勢力在東南亞區域擴張（尤其是當時印尼的蘇卡諾政權狀況），因此在 1976 年澳洲密情局（*Australian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ASIS*）與日本內閣研究辦公室安排互設聯絡人（這個安排同時出現於 1970 年代的澳洲聯合情報組織與日本防衛廳之間）。²³就區域安全合作方面而言，在 1970-1980 年代間，澳日在政策規畫與學術方面的頻繁互動，使得雙方因此發展出在區域合作的情報交流與政策實踐方面有密集的對話，這外交合作趨勢也因此於 1989 年成了澳洲創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重要背景。²⁴

在冷戰時期結束後，澳日在實質的安全合作上顯得更加積極，尤其是在國際和平合作方面的軍事合作。例如：日本國會在 1992 年通過《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案》奠定了日本自衛隊參與國際維和行動的法律基礎，同年日本首次派遣自衛隊前往柬埔寨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Peace Keeping Operations, PKO*），而這支維和部隊主要是由當時澳洲陸軍桑德

²² Geoffrey Bolt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ume 5: The Middle Way 1942-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7-10, 15.

²³ Desmond Ball,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Current El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eds.),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64-185.

²⁴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簡稱「亞太經合會」。在 1989 年 11 月由澳洲時任總理霍克（Bob Hawke）創立，該會的性質是在亞太區內各地區之間促進經濟成長、合作、貿易、投資的論壇。APEC 是個政府間組織，各會員體以經濟體（Economy）身分加入，我國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義於 1991 年成為 APEC 之一員。目前有 21 個經濟體，包括：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中國、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巴紐、秘魯、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泰國、美國及越南。

森將軍 (Lieutenant General John Sanderson) 所指揮。²⁵在 2000 年底，日本再次派遣自衛隊參與聯合國在東帝汶 (East Timor) 的維和行動。同樣地，這次維和部隊亦是由澳洲政府所領導並由時任澳洲陸軍柯施羅夫將軍 (Major General Peter Cosgrove) 所指揮。在 2004-2006 年間，日本派出約 500 名堅強的自衛隊工程部隊前往伊拉克穆薩納省薩瑪沃城 (Samawa, Muthan-na Province) 與澳洲軍隊共同合作維護該城鎮的安全。²⁶在 2011 年 11 月，聯合國在南蘇丹 (South Sudan) 維和行動中，在聯合國南蘇丹派遣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South Sudan, UNMISS) 指揮下，日本自衛隊與澳洲軍隊也曾進行安全合作。由於使用武力的限制，使日本自衛隊暴露在具有安全風險的複雜維和行動中，為確保自衛隊人員安全，日本政府在 2016 年 11 月開始允許自衛隊承擔「確保維和人員安全」與「馳援護衛」兩大任務，此不僅放寬自衛隊在維和行動中有限的支援角色，擴大自衛隊行動範圍與使用武器標準，²⁷大大提升了的日本自衛隊在國際維和行動中的存在感與安全感。

除了執行聯合國 PKO 任務的合作外，澳日關係在雙邊安全政策與軍事對話方面更是不斷的朝制度化方向發展。就安全政策對話而言，澳日自 2007 年以來至 2022 年 12 月已經舉行了 10 次外交與軍事的「二加二部長會議」(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²⁸澳洲國防軍與日本自衛隊在這互信之基礎上進行了名為「日豪三叉戟」(Nichi-Gou Trident) 聯合軍事訓練，包括：水面艦、潛艦、海上偵察機等方面的聯合訓練，在 2011 年日本航空自衛隊的 F-15 戰機首次與澳洲皇家空軍 F/A-18 戰機進行雙邊戰鬥訓練。除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之外，澳日這些軍隊對軍隊的互動有助於催化雙邊軍事關係的成熟發展，並且強化雙方軍事的「協同操作能力」(interoperability)。

值得一提的是，澳洲在前陸克文 (Kevin Rudd) 政府時期，比起之

²⁵ Desmond Ball, op. cit., p. 174.

²⁶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2006 Defense of Japan* (Tokyo: Gyosei, 2006), p. 229.

²⁷ 〈當日本自衛隊被允許在海外「動武」〉，《日本經濟新聞》，2016 年 11 月 16 日，<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tics/society/22367-20161116.html>.

²⁸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Key Documents: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penny-wong/media-release/tenth-japan-australia-22-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ial-consultations>.

前霍華德政府，對日本的態度就顯得較為冷淡許多，這態度表現在陸克文於 2007 年底當選澳洲總理之後，其首次到海外拜訪的國家是中國，並且有意冷落日本，這顯示出當時澳洲工黨政府的親中的態度。²⁹儘管如此，當時澳洲政府仍然聲稱會遵循前任政府建立起來的外交架構，所以陸克文在 2008 年 6 月訪問日本與日本時任首相福田康夫（Yasuo Fukuda）會晤時雙方同意發表「全面戰略、安全與經濟夥伴聯合聲明」，此舉不僅確定也支撐了澳日雙邊關係持續發展的動力。在吉拉德（Julia Gillard）繼任陸克文為澳洲總理後，同樣也視日本為澳洲在亞洲最緊密的夥伴。³⁰於 2012 年 9 月，澳日第 4 次外交與國防部長二加二對話中，雙方共同提出「為和平與穩定合作的共同願景和目標」（Cooperating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Common Vision and Objectives）聲明。³¹該聲明可以說是澳日關係發展具體行動項目的框架，界定了雙方在科技、裝備、國防建設協助與網路安全合作等新合作領域。在美國川普政府時期，在美國的印太戰略架構下以及澳日關係自 2007 年以來的發展基礎，造就今天澳日安全關係發展與軍事交流合作有走向准軍事同盟的趨勢。

澳日在 2007 年簽訂《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後，雙方的國防戰略思維與國防政策也隨之開始逐步調整。在國家安全方面的考量上，澳洲與日本跟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儘管中國不斷聲稱擴充軍費是為了建立因應現代資訊化戰爭與多領域作戰能力，或者是為了建設一支遠洋海軍所需，但澳日雙方都對於中國崛起與擴張的現象感到疑惑與擔憂。雖然雙方在經貿上仍倚賴著中國廣大經貿市場，但在安全上也各自緊抓著美國安全保護傘。在國防安全方面，兩者也都在積極構思未來的建軍備戰規畫以因應中國軍事擴張的可能危機。換言之，中國軍力的增強與擴張，不僅決定著澳日在國防方面的建軍備戰方向，同時也促成雙方安全合作關係的緊密發展。不同之處在於，澳洲在地緣上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沒有日本來得敏感，由於日本與中國一直存有釣魚台衝突的壓力，所以日本對於外交結盟的戰略規畫比澳洲更早，也更為積極，像是「四方安

²⁹ Yusuke Ishihara,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 and the Rise of China: Pursuing the 'Bilateral-Pls' Approaches," UNISCI Discussion Paper, No. 32, May 2013, p. 86.

³⁰ Bob Carr, "Address to the 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y 18, 2012, https://s3-us-west-2.amazonaws.com/jnpc-prd-public-oregon/files/2012/06/20120518-FM-Carr-speech-_E_.pdf.

³¹ "Australia and Japan-Cooperating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Common Vision and Objectives," 4th Australia-Japan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September 2012,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034392.pdf>.

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

肆、澳日安全關係發展中的互信建立

對於中國崛起的現象，澳日與很多區域國家都是採取「雙軌策略」(亦稱「兩手策略」)來因應來自於中國的安全威脅與經濟誘因。而這雙軌策略在國際上經常被界定為「交往與制衡」(Engagement and Balancing)、「圍堵加交往」(conengagement)與「整合且避險」(Integration but Hedge)等方式。近幾年避險概念在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使用率逐漸增加，基本上這個概念就如同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麥艾文所言，避險「如同現實主義型態的權力平衡，是一種與其他國家的外在安全合作形式，同時也是國家軍事現代化的規畫。」³²具體來說，目前澳日進行安全合作的是一個雙方建構「互信」(Mutual Trust)的議程，並且值得雙方在科技與裝備合作上發展出緊密的安全關係。這促進澳日安全合作的互信議程，包含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日本政府改變長期以來的出口管制政策。自冷戰以來，日本政府就長期施行獨一無二的嚴格方式來管控武器出口。在1967年4月，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Eisaku Sato)提出「武器出口三項基本原則」：日本不會批准將武器出口至共產主義陣營國家、被聯合國制裁的國家，以及涉入國際衝突的當事國或有衝突危險的國家等三類。於1976年2月27日，前日本首相三木武夫(Miki Takeo)更提出，對三原則對象以外的地區也不出售武器與製造武器的機械，使得該原則適用範圍擴大。在1981年1月，日本國會則作出了《關於武器出口問題的決議》，此後日本就一直實行禁止對任何國家出口武器的政策，³³但對美國則是例外。³⁴直到了野田佳彥(Noda Yoshihiko)擔任首相之後，日本政府於2011年12月依據聯合軍力發展的國際趨勢(例如：F-35戰機的生產合作)與日本國內日漸緊縮的國防產業之後，開始重新審查與修正其武器出口政策，同意大幅放寬基於「武器出口三原則」的禁運政策，允許日本參與

³² Evan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5, p. 145.

³³ 〈日本武器出口原則轉向有三個目的〉，《日本經濟新聞》，2014年4月2日，<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tics/society/8700-20140402.html>。

³⁴ 在1983年1月14日，時任日本官房長官後藤田正晴(Gotoda Masaharu)發表「對美國的武器製作技術許可的講話」，指出根據《日美安保條約》，向美國出售武器製作技術不在三原則之內，視同「特例」處理。

跨國武器的聯合研發、生產以及出於人道主義的裝備提供。於 2014 年 3 月 6 日，前日本安倍政府確定修改長期武器出口的政策內容，提出「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過去消極的武器出口三原則禁令之後，並於同年 4 月 1 日於日本內閣會議通過。³⁵這新政策不僅同意日本在國際和平合作任務的需求下可將裝備轉移至外國，也准許跟日本維持安全合作的國家進行國際聯合發展與生產，澳日也因此開啟了雙邊進行聯合軍事發展的新契機。

第二、澳洲曾有意在潛艦計畫上與日本合作，而日本也願意提供技術支援。澳洲在 2007 年初就已經研擬取代現役老舊柯林斯級（*Collins-Class*）的新一代柴電潛艦計畫，自 2009 年 5 月起就開始推行潛艦建造計畫，計畫名稱為「未來潛艦計畫」（*Future Submarine Program*），代號為「海洋 1000」（*SEA 1000*）。該計畫的主要目標是要引進 12 艘新式常規柴電動力潛艦，預計從 2025 年起陸續取代原本的 6 艘柯林斯級潛艦。³⁶雖然澳洲早有這項海軍潛艦發展規畫，然而其本身卻沒有足夠且充分的人才、技術與材料基礎建設來進行這項潛艦建造計畫，所以這計畫因此延宕了一段時間。於 2013 年 9 月，澳洲自由黨取代工黨重獲執政權之後，澳洲政府仍持續海軍擴張政策，在 2016 年版國防白皮書中進一步強調，各國的先進潛艦在未來 20 年，有半數以上會集中在澳洲最關切的印太（*Indo-Pacific*）地區活動，為此澳洲需要強大的軍力來確保安全利益，打造 12 艘潛艦是必要的軍事建設。³⁷

當時澳洲潛艦計畫的國外合作廠商候選名單有：瑞典考庫姆公司（*Kockums*）、法國海軍造船局集團（*Direction des Constructions Navales Services, DCNS*）、德國哈德威造船廠（*Howaldtswerke-Deutsche Werft, HDW*）、西班牙納凡蒂亞造船集團（*Navantia*）與日本防衛省技術研究本部（*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TRDI*）等。³⁸在這些西方公司中只有日本沒有輸出軍火與參與投標的國際經驗，加上當時澳洲認為只有日本的潛艦體型相對較大，且相關製造技術較為傑出，又與美國有相容的水下作戰系統，在軍事戰略上可以在西太平洋中與美日進

³⁵ 〈武器輸出、包括容認へ政府が新原則を閣議決定〉，《日本經濟新聞》，2014 年 4 月 1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01003_R00C14A4000000/。

³⁶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2009, p. 64.

³⁷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ce White Paper 2016," 2016, pp. 18-19, 42.

³⁸ Yusuke Ishihara, *op. cit.*, p. 88.

行軍事協作（為因應中國在西太平洋的擴張），澳日對該造艦計畫開始展開雙邊對話與交流。但是最後由於澳洲國內政治因素以及日本的軍事相關技術出口沒經驗的侷限性，³⁹澳洲政府在 2016 年 12 月選擇法國為潛艦建造的主承包商，因該廠商的提案最符合澳洲特殊的戰略與經濟需求。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澳英美安全夥伴關係」（AUKUS）成立後澳洲就終止與法國的潛艦合作案，轉向與英美合作發展核動力潛艦，並預計要打造 8 艘。⁴⁰

自從習近平成為中國國家領導人以來，其外交作為不再採取韜光養晦的態度，解放軍海軍更積極擴張要從西太平洋的第一島鏈擴張至第二島鏈以外，面對中國在區域的戰略壓迫與美中競爭的局勢下，澳洲因此曾試圖在與美國同盟的架構（美日與美澳安全關係）下與日本合作發展新式日系柴電潛艦，在日本方面也願意支持澳洲的潛艦建案，所以雙方都曾有意願在該潛艦案上聯手合作，以拉近彼此的安全合作關係。雖然日本首次參與澳洲潛艦製造標案失利，但雙邊安全關係的後續發展仍不受影響。從澳日曾企圖在潛艦案上進行合作的態勢來看，是雙方針對中國可能海上威脅之合作企圖相當明顯。

第三、澳日積極進行例行的雙方聯合軍事訓練與演習。除了與美國進行軍演與軍訓之外，在拓展澳日安全合作的基礎上，雙方不僅在執行聯合國 PKO 任務的基礎上合作，雙方也在海空面向進行聯合軍訓與軍演，例如：「日豪三叉戟」演習。澳日首次的三叉戟演習是在 2009 年，演習的課目主要是集中在雙方進行聯合反潛作戰的訓練。在 2011 年，日本航空自衛隊與澳洲皇家空軍進行首次軍事交流，並在阿拉斯加進行雙邊首次聯合訓練與作戰演習。⁴¹於 2020 年 11 月 17 日，時任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訪問日本東京，並與日本首相菅義偉（Yoshihide Suga）會晤，雙方討論旅遊、經濟合作、軍事合作等議題，並在閉門會談後宣佈達成《互惠准入協定》，方便兩國日後共同進行聯合訓練和演習，以期能共同抗衡中國。據澳洲《雪梨晨鋒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報導，這個協議允許兩國軍隊互相訪問，同時促進兩國在彼此

³⁹ 郭育仁，〈日本國防工業的非競爭體質與澳洲潛艦個案〉，《台北論壇》，2016 年 5 月 16 日，http://www.taipeiforum.org.tw/view_pdf/285.pdf。

⁴⁰ Courtney McBride, “France Recalls Ambassadors to U.S., Australia Over Submarine De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7,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france-recalls-ambassadors-to-u-s-australia-11631908666>.

⁴¹ Yusuke Ishihara, op. cit., p. 89.

領土上進行訓練和聯合軍演。在該協定中，澳日同意共同擬定一個軍事合作架構，以便日本自衛隊可以在必要時以流暢的行政程序來協防澳洲軍隊，這意圖牽制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擴張相當明確。⁴²此外，未來雙方也同意加深在 5G 網路、海底電纜、關鍵礦產供應的安全性等方面的合作。

伍、澳日安全關係發展中的理念基礎

澳日試圖以強化雙邊安全關係為基礎來參與國際多邊關係，雙方主要的共同利益與戰略目標不外乎就是為了因應中國的崛起，以及考量美國實力的式微。儘管澳日各自與中國的關係因地緣之故而有差異，但是在涉及中國崛起的歷史過程中，澳日對於維護和促進什麼樣的國際秩序這一更廣泛的問題上，雙邊的觀點是緊密一致的，這表現在三個相互關聯的共同理念：

一、共同支持以美國為中心的軍事同盟關係

在印太區域權力轉移的情況下，日本和澳洲政府加強與美國同盟的政策都是一致的，雙方都各自強調與美國聯盟對於國家與區域安全的重要性，因此都異口同聲支持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作用。儘管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崛起挑戰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聯盟體系，但澳日政府對此都持不同意見。

就日本方面，為了鞏固美日同盟關係，日本自安倍政府開始就積極在採取一系列舉措，像是對日本憲法中的集體自衛權解釋與審查，而此舉背後的動機就是中國的擴張壓力深化日本對「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認知，使得日本更加重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⁴³日本不僅支持美國對區域安全的參與，同時透過更廣泛的區域演習與美國合作，例如：年度「黃金眼鏡蛇演習」(Cobra Gold Exercises)、「太平洋夥伴關係」(Pacific Partnership)活動、「可汗探索演習」(Khan Quest Exercise)、「環太平洋軍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以及與澳洲

⁴² Anthony Galloway and Eryk Bagshaw, "Australia and Japan to Ramp up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after Landmark Dea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November 17, 2020,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australia-and-japan-to-ramp-up-joint-military-exercises-after-landmark-deal-20201117-p56ffx.html>.

⁴³ 黃恩浩，〈中國崛起與中日釣魚台爭端〉，《戰略與評估》，第 9 期第 1 卷，2018 年 12 月，頁 7-9。

和印度的雙邊或多邊聯演等方面。

同樣地，在追隨大國的戰略文化基礎上，澳洲也一直在努力鞏固並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早在 2011 年 11 月，美國前歐巴馬總統和澳洲前總理吉拉德宣布兩國將開始就「部隊態勢倡議」(*Force Posture Initiative*) 進行合作，其中包括：在澳洲北領地的達爾文部署海軍陸戰隊，以及同意美國空軍進入北澳的基地。⁴⁴面對中國向西太平洋擴張的壓力，澳洲一直視美國為區域安全支柱，美澳同盟是澳洲看待印太戰略的核心，如無美國作為安全後盾，印太權力平衡將被挑戰，南太安全區域亦會受到衝擊，所以澳洲一直致力深化澳美同盟合作，包括支持《美國兵力部署倡議》(*United States 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同意美國海軍陸戰隊每年在澳洲移訓，以及在北領地興建軍事設施，進行各項澳美聯合軍演等。⁴⁵

二、共同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安全秩序

澳日對國際秩序的共同看法，可以從雙方在國際場合支持自由國際秩序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共識中看出。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國際自由秩序被視為和平與繁榮的基礎，日本前安倍首相的相當重視日本長期以來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支持，諸如：自由航行和貿易自由、繁榮的經濟關係、人類安全與法治等共同的國際原則，並將這些國際原則作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澳洲政府同樣也一再強調自由國際秩序的重要性。澳洲 2017 年的《外交政策白皮書》(*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明白指出，儘管國際政治的變化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但隨著中國崛起，澳洲堅持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多邊合作，反對任何國家片面改變區域秩序。

三、共同支持第三國在國際上扮演重要角色

日本和澳洲對於支持其他國家在區域和全球扮演重要且活躍的角色有著共同的想法，並積極發展以及強化與這些國家的密切外交關係。

⁴⁴ Parliament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Gillard of Australi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Canberra, Australia, November 16,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6/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gillard-australia-joint-press>.

⁴⁵ Australian Government, "United States 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 *Department of Defence*, <https://www.defence.gov.au/Initiatives/USFPI/>.

目前，日本積極與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甚至是韓國等國家建立廣泛的安全關係網絡就反映了這個看法。⁴⁶此外，在支持自由國際體系的前提下，日本長期通過的官方對外援助和支援他國的國防能力建設，使得這些受援助的區域國家能提升國家治理能力與扮演國際重要角色。同樣地，澳洲也相當強調援助新興國家的重要性，例如：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以及南太國家。實際上，澳洲一直是維持區域關係穩定的有力推手，例如：將澳洲與印度的關係制度化、啟動雙方年度領導人高峰會，以及推動澳洲與印尼定期舉行的外交與國防部長的二加二會議，並發表聯合安全聲明，以及強化國防合作，像是澳洲同意印尼軍隊可以定期在澳洲境內進行軍事訓練等。⁴⁷

陸、澳日安全關係發展中的避險作為

在中美競爭的國際態勢下，澳日雙邊安全關係的發展，很明顯是為了在「扈從」美國與「抗衡」中國之間走出第三條路。因為中國對澳日而言，在經貿方面仍是依賴中國市場較多，澳日很難不考慮經濟利益，而在中美競爭關係中完全靠向美國以制衡中國。再者，中國對外擴張的確已造成印太區域的「安全困境」，對區域而言中國是個主要安全威脅但並非是敵人，對此美國在前川普政府與現任拜登政府都將中國在區域的角色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並聲明美中關係並非是敵對關係。因此，從 2007 年以後的澳日安全關係發展來看，澳日在面對美中戰略競爭的印太戰略佈局上，雙方似乎更願意以強化雙邊安全關係作為「避險」基礎，來參與國際多邊機制並同時與中國交往、回應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的軍事同盟架構，以及有意共同合作為第三國建立能力。以下就這四個面向進行分析：

一、在國際多邊主義架構中拓展澳日安全關係

在印太區域中，澳日安全關係的發展主要是為了因應美中對抗的局

⁴⁶ Ryo Sahashi, "Conceptualising the Three-Tier Approach to Analyse the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SDCS Working Paper*, No. 415, December 2009.

⁴⁷ Australian Government, "1st Indonesia-Australia Annual Leaders' Meeting - Joint Communique,"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November 21, 2011, <https://pmtranscripts.pmc.gov.au/release/transcript-18287>; 天睿,〈澳洲與印尼 2+2 部長會談，擴大國防合作〉，《大紀元》，2021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9/10/n13223405.htm>。

勢，所以雙方試圖在雙邊關係基礎上，來參與或擴大國際多邊主義架構，並在多邊架構下與中國交往，企圖藉此來牽制中國影響力擴張。而這個避險策略最早是出現在 1980 年代晚期至 1990 年代初期亞太經合會（APEC）的成立與擴大之經驗。早在 1960 年代日本就有成立一個泛亞洲合作組織的想法，但並未獲得國際支持而有具體的進展。⁴⁸直到 1980 年代，鑑於當時歐洲及北美地區已逐漸形成經貿共同市場或自由貿易協定，亞太地區的國家開始體認到有需要成立一個政府間經濟合作的非正式協商論壇，以討論並解決共同關切的經貿議題。因此，澳洲於 1989 年年初提議在亞太地區創立一個經濟合作組織，而日本當時為獲取鄰國信任因此大力支持澳洲，雙方目的在希望藉部長間的諮商會議這平台，尋求亞太地區經貿政策之協調，減少貿易與投資壁壘，促進區域的貿易自由化與區域合作，以維持區域經貿穩定成長與發展。

隨著亞洲經濟自由化帶來的競爭日益激烈，澳日雙方在區域多邊主義上的合作案例除了亞太經合會外，尚有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案例。於 1995 年，「東協加三」（ASEAN+3）合作機制正式啟動，在回應中國崛起之前提下，首次東亞高峰會在 2005 年 12 月首次舉行，之後每年一次由泛東亞地區 16 個國家領導人參加的國際高峰會議。日本在 ASEAN+3 多邊機制中積極呼籲東協應該在 ASEAN+3 之外再納入其他區域國家參與，包含：澳洲、紐西蘭與印度。在這方面，除了日本努力加強外交活動來說服其他區域國家外，多數東協國家也開始在實質層面上支持澳洲參與。就澳洲方面，當時霍華德政府最初不願接受東亞高峰會的癥結點之一在於猶豫是否要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因東協將該約作為加入東亞高峰會的標準之一。而這問題就在於，澳洲當時尚不清楚該條約對於《澳紐美安全條約》（*ANZUS Treaty*）所承擔的義務有什麼影響。⁴⁹對此，日本則提供澳洲相關法律的研究結論，認為該條約不會對美澳軍事同盟的義務產生負面影響。在日本的外交與法律支持下，澳洲因此簽署《友好合作條約》亦同時成為東亞高峰會創始會員。儘管也有其他國家（印度與新加坡）在擴展東亞高峰會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澳日合作與效

⁴⁸ 李瓊莉，〈日本與亞太多邊機制的形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頁 102-107。

⁴⁹ Takashi Terada, "The origins of ASEAN+6 and Japan's Initiatives: China's Rise and the Agent-structure Analy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3, No. 1, March 2010, pp. 83-84.

益應被視為擴大區域多邊合作更重要的部分。

事實證明，努力擴大多邊主義的影響是深遠的。澳洲、印度和紐西蘭的加入東協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先例，表明了東亞高峰會向原本東協加三以外的其他國家開放，擴大了該峰會的多元性。此外，澳洲加入東亞高峰會之舉也建立了標準，未來任何其他希望加入東亞峰會的國家都必須滿足簽署《友好合作條約》這項條件，這些先例更無疑幫助前美國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政策的推展，⁵⁰以及在 2011 年加入東亞高峰會。這些區域多邊主義的努力富有巨大潛力，因為操作多邊主義可使該地區國家能夠在各種問題上與中國接觸，包括：海事行為準則、跨國安全問題、實際軍事交流，以及各國高層定期互動等。從這意義上來說，澳日在區域多邊主義中的合作是其雙方在與中國接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這樣的努力也可以在其他機制中看到，包括：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Pus）和西太平洋海軍會議（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然而這也可以看出，面對中國問題，日本與澳洲的對外政策有其戰略上的主動性，不必然受美日與美澳雙邊主義所牽制。

二、在美國軍事同盟關係下拓展澳日安全合作

維持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共同支持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參與和存在，可以說是澳日發展雙邊安全關係的重要基礎。對美國的印太戰略而言，澳日在地緣政治上是相當重要的兩個戰略支柱，儘管澳日之間沒有簽署正式軍事同盟協定，但在雙方簽訂《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和《資訊安全協定》（*Information Security Agreement*）之後，使得美澳日三方可以有法律基礎來深化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安全合作。在該協定基礎上，這三方國防部長在 2012 年 6 月新加坡舉辦的「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中共同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並同意為「強大動能與靈活的」（Strong Dynamic and Flexible）夥伴關係建構聯合行動計畫，⁵¹而這三方合作的行動計畫在近年來的聯合救災行動中已經獲得重要的實踐。於同年 6 月

⁵⁰ 林正義，〈美國重返東亞的意義〉，《新社會政策》，第 13 期，2010 年 12 月，頁 4-6。

⁵¹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Australia-and Japan Meeting at Shangri-La,”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Release*, June 2, 2012,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5338>.

2日，澳日雙方國防部長在聯合新聞稿中，更重申要建立穩固的雙邊國防關係的承諾。作為美國在印太的親密朋友和盟友，澳日都確認在一系列安全領域的發展與合作，除了在上述協定的基礎上合作外，更要持續舉行外交和國防部長級「二加二」會議。

在這美澳日三邊互信合作的基礎上，澳日雙邊安全合作領域也順勢獲得了拓展，例如：美澳日共同舉辦「太平洋全球航空機動研討會」（Pacific Global Air Mobility Seminar, PGAMS），舉辦該研討會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提升三國因應非傳統安全的行動規畫與能力評估，並強化同盟國之間集體進行人道救援與救災的運輸合作能力。在2007年PGAMS研討會的平台，除美國空軍展示了C-17和日本航空自衛隊C-130等飛機的部署演練，這三個國家也分別在日本橫田空軍基地（Yokota Air Base）提供個別的運輸計畫。在2008年2月下旬，這三個國家再次聚集於PGAMS會議上，在該會議期間，美國空軍的C-17運輸機執行了裝載日本陸上自衛隊CH-47直升機的任務。而這些三方合作規畫演練的實踐在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災救助行動上可以看出。於2012年6月，為了加強美澳日三方平時人道救援／災害防救（Humanitarian Assistance / Disaster Relief, HA/DR）和維和行動（PKO）的合作，澳洲陸軍首次參加了日本陸上自衛隊、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之間的高階研討會。⁵²

這三方在非傳統領域的實際行動，對美國而言則有三項幫助。首先是分擔安全責任，有效率的三邊合作關係將有助於減輕美國對區域提供安全公共財的負擔，即使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負擔分擔其影響也是深遠的，像是在HA/DR與PKO領域的合作中，由多方共同分擔能使美國能將更多資源分配到其他議程中，例如：傳統安全任務領域。⁵³其次，美國及其盟國與夥伴之間的合作行動，不僅是向美國國內，且是向其他國際行為者展示了美方與理念相近盟國與夥伴堅強的合作基礎以及對

⁵² William Tow, “The Broader Context: How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 ‘Fit’ into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Dynamics,” in William Tow and Rikki Kersten (eds.), *B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Security: Australia,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12), p. 151.

⁵³ Tomohiko Satake, “Japan, Australi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urden-Shar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William Tow and Rikki Kersten (eds.), *B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Security: Australia,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12), pp. 183-244.

安全的承諾。最後，三方有效地進行 HA/DR 和 PKO 任務行動，將有助於鞏固美國在太平洋區域中的地位。換言之，對於有效率救災行動的國際能見度，必然有助於改善美國在受災國家的公眾形象，反之亦使美國能夠更進一步地強化與這些國家的關係。

為了因應中國對亞洲的威脅，美國自歐巴馬政府提倡亞洲「再平衡」政策開始再到川普與拜登建構的「印太戰略」，這三個國家之間的積極合作模式就已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美國區域戰略主要的特徵乃在於，強調美國武裝部隊在印太區域活動就是美國在區域上展現存在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國「再平衡」戰略與「印太戰略」所產生的具體政策成果，就是美國自 2012 年 9 月開始派遣海軍陸戰隊輪流部署在澳洲達爾文、不斷增加空軍對澳洲北部的訪問，以及與東南亞國家進行聯合軍事訓練。美國當時為增加對區域的影響力，而選擇依靠其盟友的軍事基地（而不是通過建設海外永久性基地）作為其軍事前沿存在基礎，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日益困難的財政狀況使歐巴馬政府無法再建立昂貴的軍事基地。第二、過去經驗證明，美國在他國建立美軍基地常常導致美方與當地國的關係複雜化。⁵⁴如果美國牽制中國的戰略越來越依賴美日本澳三方聯合訓練與軍事合作，未來三方積極的傳統演習和非傳統軍事行動將變得更加重要。

澳日支持美國力量在區域上的存在則有助區域因應中國威脅，理由有二：一方面，支持美國國際強國地位可使美國有信心和實力與中國接觸。另一方面，美國對區域的安全承諾是美日與美澳聯盟體系重要的組成部分，該體系在牽制中國擴張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國在應對中國崛起的影響方面扮演關鍵作用就是讓日本放心，而澳洲追求美澳日三方合作的意圖就是協助美國履行其對區域的安全承諾。在 1990 年代，當澳洲提升與日本安全關係時，澳洲政府內部越來越認識到美日同盟的戰略意義。換言之，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美日同盟的戰略功能之一就是向日方提供安全保證，以因應中國威脅。⁵⁵從澳

⁵⁴ Tomohiko Satake and Yusuke Ishihara, "America's Rebalance to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Japan-US-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19, No. 2, 2012, pp. 6-25.

⁵⁵ Hugh White, "Trilateralism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nd the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America and Japan," in William Tow, Mark Thomson, Yoshinobu Yamamoto, Satu Limaye, *Asia-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104.

洲角度來看，這種功能有助於防止中日發生衝突並破壞區域秩序，所以澳洲認為支持美日同盟並強化澳日安全關係，乃是符合澳洲國家安全利益。⁵⁶

以南海安全議題為例，澳日雙方幾乎與美國的「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 政策一致。為因應中國在南海區域持續擴張，美國前國防部長馬提斯 (James Mattis)、澳洲前國防部長佩恩 (Marise Payne)、日本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 (Itsunori Onodera) 於 2018 年 6 月 2 日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談時，於 6 月 3 日針對中國將南海島礁軍事基地化的行為發布三方聯合聲明，表示不允許任何單方面以軍事手段改變南海現況的行為。再者，三邊均不同意南海地區被作為軍事目標與單方面用軍事手段改變現況，堅持應遵從國際法處理問題，同時表明美澳日三邊方會持續掌握南海局勢，要共同為防衛印太地區，並研議相關軍事戰略合作辦法。

三、在四方安全對話架構中深化澳日安全連結

呼籲組成美日印澳「民主鑽石」安全聯盟的概念最早源於 2007 年安倍首次組閣時提出之「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外交構想，隔年遂出現「印太」(Asia-Pacific) 概念，其戰略目的就是要因應中國的擴張。⁵⁷ 安倍第二次執政後，於 2012 年 12 月 27 日在捷克《報業聯盟》(Project Syndicate) 網站上發表〈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一文，呼籲美澳日印四國建立安全機制因應中國的威脅。⁵⁸ 同月亦於首相官邸網站發表「日本外交新五原則」表示，應建立橫跨印度洋及太平洋的關係網絡以促進兩大洋之安全繁榮。

在時任日本安倍首相在 2007 年發起「四方安全對話」(QUAD) 之後，不僅得到當時美國小布希時期副總統錢尼 (Dick Cheney)、時任印度總理辛格 (Manmohan Singh)、時任澳洲總理霍華德 (John Howard)

⁵⁶ Ibid.

⁵⁷ Yuichi Hosoya,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Grand Strategy: 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nd the Future Asian Order," *Asia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1, May 2011, pp. 13-24.

⁵⁸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的支持，近年更在 QUAD 的基礎上進行了名為「馬拉巴爾」(Malabar) 的軍事演習 (2015 年日本正式加入，2020 年澳洲正式加入)，以藉此回應中國在印太區域的軍事擴張。繼澳日於 2014 年確立「特殊戰略夥伴關係」後，安倍在 2016 年 11 月再與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D. Modi) 會晤，雙方同意將安倍「民主鑽石」與莫迪「東向政策」結合，而當時美國川普 (Donald J. Trump) 勝選就任總統之前，安倍亦赴美與川普會面 2 次，皆顯示安倍持續拉攏美澳印，以促「民主鑽石」從戰略性宣示轉為實質戰略作為。

再者，釣魚台爭議一直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不定時炸彈，雖然中國與日本在 1970 年代已達成擱置釣魚台爭議的默契，但是而隨中國崛起導致這雙邊默契逐漸被打破。在 2010 年 9 月 7 日發生「中日釣魚台撞船事件」之後，中國官方開始試圖以行動來片面改變該海域現狀，造成日本政府因此備感威脅。⁵⁹日本政府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宣佈對釣魚台「國有化」之後，中國公務船巡航釣魚台海域的次數增加，使得中日在釣魚台的爭議逐漸白熱化，中日關係跌到 1972 年「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東海局勢也隨之緊繃。

在呼籲外交安全結盟的同時，東海撞船事件使日本直接感受到中國威脅的嚴重性，時任安倍政府因此積極推動國防戰略轉型。在 2010 年 12 月發布新《防衛計畫大綱》，文中日本在威脅判斷上針對中國的意圖相當明顯，比起 1996 與 2006 年兩次大綱修訂有所不同。新大綱指出，中國積極推進軍事現代化，已成為地區和國際的擔憂事項。自衛隊整體部隊部署及規模也必須改變，在地理位置與中國較為接近的西南諸島上將派駐陸上自衛隊沿岸監視部隊並部署航空自衛隊的自行式雷達。在軍事戰略上強調「主動遏制」，並從「基礎防衛力」的方針，轉為強化「機動防衛力」的戰略思維。換言之，在面對軍事威脅時，要加強針對特定區域的常態化警戒、監視活動等，通過機動靈活地部署運用部隊來提高遏制力。軍隊建設上則轉向「動態防衛力量」，強調作戰上更加重視聯合快速反應。在軍事外交上則強調建設以日美軍事同盟為核心的區域同

⁵⁹ 島山京子，〈「中日爭奪亞洲區域領導地位之靜默對抗」〉，《歐亞研究》，第 2 期，2018 年 1 月，頁 105-112。

盟體系。⁶⁰

由於地理因素所以當時澳洲對於中國擴張壓力感受程度較低，甚至不把中國視為威脅，並且將與中國經貿交流視為跟美國安全結盟一樣都是澳洲重要的國家利益，所以在陸克文於 2007 年底當選澳洲總理之後，在 2008 年赴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會面時，為了保持跟中國良好關係，乃公開承諾澳洲會退出 QUAD 並不參與馬拉巴爾軍演，之後繼任的吉拉德亦是保持不參與態度。當時又加上繼安倍之後的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對於發展 QUAD 有心無力，這個四國同盟在當時澳洲宣布退出且日本無力推促下而停滯了一段時間。

雖然當時陸克文不將中國視為威脅，在 2009 年 5 月發表的《2009 年國防白皮書》卻提到：「如果沒有一個令人感到信服的解釋，中國軍事現代化無論從發展速度，還是從領域和結構方面，的確令其周邊國家感到擔心。」⁶¹該白皮書預計在 2030 年之前投入約 2,263 億美元進行軍備建設，要增強海和空軍力量，以應對中國或其他國家的軍事崛起，以及亞太地區格局的變化。⁶²可見，該版國防白皮書是將中國擴張視為一個影響區域安全穩定的因素。

相較於當時澳洲在軍事上視中國為威脅，在外交上卻不這麼認為。在繼陸克文之後的澳洲總理吉拉德在 2012 年 10 月發表的《亞洲世紀中的澳洲》（*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白皮書中強調，21 世紀是亞洲的世紀，澳洲應思考在未來如何抓住亞洲躍進的難得機遇，並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吉拉德在白皮書前言中明確表示，要讓澳洲「成為一個更了解亞洲、更具亞洲能力的國家」（more Asia-literate and Asia-capable nation），⁶³但是該白皮書的整體調性卻是特別關注，究竟澳洲如

⁶⁰ 楚良一，〈十年來中國在日本《防衛計畫大綱》中的角色變換〉，《RFI》，2013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rfi.fr/tw/中國/20131222-十年來中國在日本《防衛計畫大綱》中的角色變換>。

⁶¹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9 Defence White Paper: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Canberra: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09), pp. 74-81.

⁶² 根據澳洲《2009 年國防白皮書》，增強海空力量是包括：購買 12 艘具對地攻擊能力的潛艇、3 艘防空作戰驅逐艦、8 艘大型驅逐艦、3 艘直升機驅逐艦、100 部 F-35 聯合打擊戰鬥機、8 部海上巡邏機、46 部 MRH-90「虎式」武裝直升機、100 部裝甲車等等。

⁶³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2 White Paper: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2012, p. iii.

何能從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中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此外，在吉拉德任內發布的《2013年國防白皮書》指出，中國正在改變附近地區的戰略秩序，但中國不再是一個重要威脅，澳洲「歡迎中國的崛起」。⁶⁴這意味著，澳洲在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架構下試圖想走出自己的澳中關係，但也意味著澳洲面對中國崛起而感到畏縮不願對抗的心態。⁶⁵

具體來說，自2007年開始，澳洲與日本的最大出口貿易國就是中國，但是日本經濟發展在依賴中國市場同時，也積極在進行外交安全結盟的戰略部署，以因應中國軍事政治在區域的擴張，儘管《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是日本的安全基礎。同樣的，自二戰後澳洲的國家安全就是以《澳紐美安全條約》為主軸，在面對中國崛起之時，澳洲並不想加入日本的外交結盟，主要的原因是澳洲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不及日本（中日間有釣魚台主權爭議），也不想參與外交結盟方面挑戰中國，而犧牲與中國緊密的經貿關係。由此可知，當時雙方面對中國所採取的「避險」策略是相當不同的。直到2017年東協峰會期間，所有成員國重新參加了談判，並恢復四邊安全對話。在馬尼拉，時任澳洲總理騰博爾（Malcolm Turnbull）、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印度總理莫迪和美國總統川普同意重啟安全對話，以便在南海地區通過外交、軍事方式對抗中國。在川普實施「美國優先」關稅政策，並導致中美貿易戰後，出於對第二次冷戰的擔憂，四邊安全對話再次得到重視。

四、協助他國建立能力同時擴大澳日安全交流

在這些長期存在的澳日以「雙邊」為中心的多邊安全政策外，還有另一種新的途徑，即澳日可能在聯合援助第三國的發展和能力建設中來提升雙邊關係。自從日本2010年公布《防衛計畫大綱》（*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以來，在日本防衛省方面就已經將「能力建設援助」作為一項新的對外任務項目。像是在2010年以後，日本政府已經開始透過輸出汽車維修技能來援助東帝汶（East Timor）、提供相關工程技術教育資源援助柬埔寨，以及提供醫學教育訓練來支援越南等。⁶⁶就澳洲而言，提供他國能力建設的任務長期以來就一直是澳洲國防部和澳洲國

⁶⁴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3 Defence White Paper: Defending Australia and Its National Interests" 2013, p. 11.

⁶⁵ 黃恩浩，〈解讀2013年版澳洲國防白皮書的中國政策〉，《台北論壇》，2013年8月22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_pdf/89.pdf。

⁶⁶ Yusuke Ishihara, op. cit., p. 93.

防軍的重要任務區域，例如：自 1980 年開始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的《太平洋巡邏艇計畫》（*Pacific Patrol Boat Program*）。發動該計畫主因是，在 1982 年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後，澳洲企圖協助南太島國有效管理其廣闊專屬經濟區（EEZ）而規畫的。在這種情況下，依據該計畫，澳洲開始為這些區域島國提供巡邏艇、相關維修服務，以及所有必要的航海訓練，以便這些小國可以有效地管理其專屬經濟區，而這正是有助於穩定澳洲周邊地區並有效促進全球海事治理。

儘管澳日都各自已經開始對第三國提供必要的能力建設援助，但雙方共同合作提供三國能力建設的大部分的項目仍然處於討論階段而尚未執行，如果雙方對第三國提供能力建設合作得到充分執行，這將有助於受惠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內治理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長遠來說亦可改善國際安全與維持國際秩序，像是有助於強化國際秩序和增加國際支持者的數量，特別是面對中國擴張對區域形成安全挑戰的狀況之下。近年來，美國與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衝突逐年加劇，美國當然也感受到支援第三國建立能力來抗拒中國影響地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南太地區，所以當美國與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競爭越演越烈之時，於 2021 年 6 月 9 日，當時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表示，美國盼與日本、紐西蘭、澳洲和其他盟友合作，協助太平洋島國發展、對話。⁶⁷坎貝爾說，「我們在這些島嶼上負有深厚的歷史道德責任和戰略利益，有時我們卻忘了這一點。」⁶⁸他強調印太地區的競爭與在各種議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吃重，因此美國期盼與澳洲、日本和紐西蘭等盟友緊密合作，就共同目的集合太平洋島國對話，並提供必要發展援助。

柒、結論

中國快速的崛起與擴張，對在民主、秩序與安全等方面理念相近的澳洲與日本而言，不僅是個經濟上的機會也是安全上的挑戰。此外，對美國孤立主義可能再起的擔憂更是澳日雙方發展安全關係的重要考量。換言之，中國擴張的威脅與美國可能的孤立主義無疑都是影響澳日建構

⁶⁷ 〈防太平洋成抗中破口，美喊話與日、澳盟友合作協助島國發展〉，《自由時報》，2021 年 6 月 9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563170>。

⁶⁸ “U.S. Says to Work with Allies to Help Pacific Islands Amid China Rivalry,” *Reuters*, June 9,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us-says-work-with-allies-help-pacific-islands-amid-china-rivalry-2021-06-08/>.

安全關係與實踐避險策略的重要關鍵。隨著近年美中戰略競爭的白熱化、中國政經軍影響力在印太區域的擴張，以及對美國強權地位與印太秩序的挑戰，澳日因此開始去思考如何在與中國交往的同時以及在美中戰略交鋒之間尋求「避險」，也就是擴大並深化澳日雙邊安全關係並共同參與多邊國際事務，以抵銷「扈從美國、抗衡中國」所帶來的可能安全風險與不確定性。

本研究結果發現，澳日積極強化安全關係是一種「戰略結盟」的表現，以結盟作為避險的策略，其作為主要呈現在多個面向，包括：在國際經貿多邊主義架構中與中國互動同時發展雙邊經貿關係；在與美國為首的美澳日三邊安全合作機制中，強化澳日雙邊主義的軍事「相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以制衡中國武力威脅；在美澳日印「四邊安全對話」架構中強化澳日安全合作，以及在共同合作援助第三國的可能性中深化雙方安全關係，以弱化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從這些澳日以結盟避險的作法中可以發現，雙方積極發展安全關係可謂是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思維結合的產物，現任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N. Albanese)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都持續朝這個戰略方向邁進，試圖持續深化雙方「準軍事同盟」關係。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自澳日於 2007 年簽署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以來迄今雙邊安全關係的建構與發展，對於澳日關係要如何因應持續不斷的美中戰略競爭、中國的軍事擴張，以及要如何分散對中國經貿依賴所帶來的安全風險等問題，雙方目前是以安全結盟作為避險的策略，並且在這策略上操作多元的避險作為。本文所整理與歸納的避險概念的確提供了筆者研究日澳安全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向，然而避險概念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仍在發展中，其在研究上的適用性與周延性亦有待後續的觀察與論證。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Bolton, Geoffrey,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ume 5: The Middle Way 1942-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Fruhiling, Stephan, *Defense Planning and Uncertainty for the Next Asia-Pacific War*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4) .
- Goh, Evelyn,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East West Center, 2005) .
- Levy, Jack,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03) , pp. 128-135.
-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2006 Defense of Japan* (Tokyo: Gyosei, 2006) .
- Satake, Tomohiko, “Japan, Australi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urden-Shar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William Tow and Rikki Kersten (eds.), *B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Security: Australia,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12) , pp. 183-244.
- Tow, William, “The Broader Context: How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 ‘Fit’ into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Dynamics,” in William Tow and Rikki Kersten (eds.), *B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Security: Australia,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12) , pp. 147-159.
-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 Weitsman, Patricia A.,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White, Hugh, “Trilateralism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nd the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America and Japan,” in William Tow, Mark Thomson, Yoshinobu Yamamoto, Satu Limaye, *Asia-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London: Routledge, 2008) , pp. 101-111.

Yamamoto, Yoshinobu, “Triangularity and US-Japanese Relations: Collaboration, Collective Hedging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William Tow, Mark Thomson, Yoshinobu Yamamoto, and Sato Limaye (eds.) , *Asia-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pp. 69-82.

二、學術性期刊論文

李瓊莉，〈日本與亞太多邊機制的形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頁 102-107。

林正義，〈美國重返東亞的意義〉，《新社會政策》，第 13 期（2010 年 12 月），頁 4-6。

畠山京子，〈「中日爭奪亞洲區域領導地位之靜默對抗」〉，《歐亞研究》，第二期，2018 年 1 月，頁 105-112。

黃恩浩，〈中國崛起與中日釣魚台爭端〉，《戰略與評估》，第 9 期第 1 卷，2018 年 12 月，頁 1-34。

Aurelia Geogre Mulgan, “Breaking the Mould: Japan’s Subtle Shift from Exclusive Bilateralism to Modest Minilater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1 April 2008, pp. 52-72.

Ball, Desmon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ustralia: Current El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Brad Williams and Andrew Newman (eds.) , *Japan, Australia,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pp. 164-185.

Bisley, Nick, “The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Declaration and the Changing Regional Security Setting: Wheels, Webs and Beyon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1, March 2008, pp. 38-52.

- Hosoya, Yuichi,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Grand Strategy: 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nd the Future Asian Order," *Asia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1, May 2011, pp. 13-24.
- Ishihara, Yusuke,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 and the Rise of China: Pursuing the 'Bilateral-Pls' Approaches," *UNISCI Discussion Paper*, No. 32, May 2013, pp. 81-98.
- Koga, Kei,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0, No.4, 2018, pp. 633-660.
-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59-185.
- Lim, Darren,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4, 2015, pp. 696-727.
- Medeiros. Evan 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5-2006, pp. 145-167.
- Sahashi, Ryo, "Conceptualising the Three-Tier Approach to Analyse the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SDCS Working Paper*, No. 415, December 2009.
- Satake, Tomohiko and Yusuke Ishihara, "America's Rebalance to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Japan-US-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19, No. 2, 2012, pp. 6-25.
- Terada, Takashi, "The origins of ASEAN+6 and Japan's initiatives: China's Rise and the Agent-structure Analy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3, No. 1, March 2010, pp. 71-92.
- Tow, William, "Asia's Competitive 'Strategic Geometries': The Australian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1 April 2008, pp. 29-51.

三、官方文件

“Australia and Japan-Cooperating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Common Vision and Objectives,” September 2012,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034392.pdf>.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Operation PACIFIC ASSIST- Extension of ADF relief efforts in Japan,” March 19, 201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601183849/http://www.minister.defence.gov.au/Smithtpl.cfm?CurrentId=11609>.

Australian Government, “1st Indonesia-Australia Annual Leaders’ Meeting - Joint Communique,” November 21, 2011, <https://pmtranscripts.pmc.gov.au/release/transcript-18287>.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9 Defence White Paper: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2009.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2 White Paper: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2012.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3 Defence White Paper: Defending Australia and Its National Interests,” 2013.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 Defence Update 2007,” 2007.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ce White Paper 2016,” 2016, pp. 18-19, 42.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2009, p. 64.

Australian Government, “United States 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 Department of Defence, <https://www.defence.gov.au/Initiatives/USFPI/>.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Key documents: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https://www.dfat.gov.au/geo/japan/Pages/key-document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Release, June 2, 2012,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5338>.

Parliament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Gillard of Australi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November 16,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6/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gillard-australia-joint-pres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Australia-and Japan Meeting at Shangri-La,” June 2, 2012,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5338>.

四、網際網路資料

〈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BBC 中文網》，2007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news.live.bbc.co.uk/chinese/trad/low/newsid_6590000/newsid_6594300/6594347.stm。

〈日本武器出口原則轉向有三個目的〉，《日本經濟新聞》，2014 年 4 月 2 日，<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8700-20140402.html>。

〈防太平洋成抗中破口，美喊話與日、澳盟友合作協助島國發展〉，《自由時報》，2021 年 6 月 9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563170>。

〈武器輸出、包括容認へ政府が新原則を閣議決定〉，《日本經濟新聞》，2014 年 4 月 1 日，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01003_R00C14A4000000。

〈當日本自衛隊被允許在海外「動武」〉，《日本經濟新聞》，2016 年 11 月 16 日，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2367-20161116.html>。

小山，〈日澳今簽《互惠准入協定》防衛合作邁大步〉，《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22 年 1 月 6 日，<https://www.rfi.fr/tw/國際/20220106-日澳今>

簽-互惠准入協定-防衛合作邁大步。

天睿，〈澳洲與印尼 2+2 部長會談，擴大國防合作〉，《大紀元》，2021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9/10/n13223405.htm>。

林勁傑，〈日澳攜手抗中擬建立盟友軍事合作〉，《中時新聞網》，2021 年 12 月 31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1231000104-260309?chdtv>。

郭育仁，〈日本國防工業的非競爭體質與澳洲潛艦個案〉，《台北論壇》，2016 年 5 月 16 日，http://www.taifeiforum.org.tw/view_pdf/285.pdf。

黃恩浩，〈解讀 2013 年版澳洲國防白皮書的中國政策〉，《台北論壇》，2013 年 8 月 22 日，http://140.119.184.164/taifeiforum/view_pdf/89.pdf。

楚良一，〈十年來中國在日本《防衛計畫大綱》中的角色變換〉，《RFI》，2013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rfi.fr/tw/中國/20131222-十年來中國在日本《防衛計畫大綱》中的角色變換>。

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有關中國已成為澳洲最大貿易夥伴及 2007 年第一季澳洲貿易概況〉，《經貿透視雙週刊》，2007 年 5 月 9 日，<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459595&iz=6>。

“U.S. Says to Work with Allies to Help Pacific Islands amid China Rivalry,” *Reuters*, June 9,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us-says-work-with-allies-help-pacific-islands-amid-china-rivalry-2021-06-08/>

Abe, Shinzo,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Anthony Galloway and Eryk Bagshaw, “Australia and Japan to Ramp up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after Landmark Dea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November 17, 2020,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australia-and-japan-to-ramp-up-joint-military-exercises-after-landmark-deal->

20201117-p56ffx.html.

Carr, Bob, “Address to the 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y 18, 2012, https://s3-us-west-2.amazonaws.com/jnpc-prd-public-oregon/files/2012/06/20120518-FM-Carr-speech-_E_.pdf.

McBride, Courtney, “France Recalls Ambassadors to U.S., Australia Over Submarine De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7,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france-recalls-ambassadors-to-u-s-australia-11631908666>.

Paramonov, Oleg, “Japan and Australia: What the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is all about,” *Modern Diplomacy*, December 15, 2020,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0/12/15/japan-and-australia-what-the-reciprocal-access-agreement-is-all-about/>.

Satake, Tomohiko, “Australia–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IIA)*, February 18, 2016,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ustralia-japan-security-cooperation/>.